

用「檔史」突破黨史——馮筱才教授研究簡介

施昱丞（臺大歷史系博士生）

縱觀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成果，檔案的運用始終是關鍵。長期以來，學界相當重視各大圖書館、檔案館所收藏的檔案。90年代以降，隨著中共改革開放的腳步，大陸各大檔案館的資料也陸續開放，開啟現代史研究嶄新的天地。嫻熟檔案的馮筱才教授，應臺大歷史系之邀，分別在2014年6月5、7、8日發表系列演講，主題分別為「新史料與新路徑：最近十年來之中國當代史研究」、「檔案與報紙的解讀與利用」及「檔案與報紙解讀之範例」，並於6月11日與學生餐敘，討論相關的研究課題。包括我在內的數位研究生，皆獲益匪淺。

馮老師於2001年獲得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，2003年任教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，2011年轉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馮老師最擅長的研究主題，是商會、商

人運動與同鄉會，設法從地方實際利益出發，還原各種群體之間的角力。他提出「僭民政治」的概念，認為近代以來基層民眾各種的集體行動，實則皆出自政客以地方派系為單位進行的操作，是各方勢力的利益交互作用的結果。其研究最大的突破，在於擺脫過去國共兩黨藉由意識形態動員地方的思路，說明基層社會內在的運作邏輯。

馮老師運用了為數可觀的檔案，這是其研究能夠深入基層的重要原因。從東北三省到江南地區，他跑遍沿海各省的檔案館；尤為可貴的是，連縣級、區級的地方小檔案館也不放過。他認為檔案就是官方內部的「政策執行史」，從中可以看到官方眼中的地方，推估政策在地方上實際執行的情況；並藉此反思地方具有哪些歷史條件，足以支持或阻礙政府政策的推動。然而檔案也是人為而成，具有高度選擇性，並不同於歷史。因此馮老師屢屢強調不能將檔案單純視為文獻，必須將其「文本化」，進而「去結構化」，反思其作者、寫作目的、預期讀者等問題，並配合其他材料共同解讀。在這點上，馮老師的觀點與Natalie Davis的想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為了讓研究生實地體驗檔案運用的訣竅，馮老師特地在課堂上帶讀幾份溫州地區的檔案。其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報紙。馮老師認為，報紙——尤其地方新聞——



▲馮筱才老師主講「新史料與新路徑：最近十年來之中國當代史研究」（2014年6月5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）。



用「檔史」突破黨史——馮筱才教授研究簡介

一是最容易進入地方時空背景的媒介。然而他也一再提醒，中國的報紙並非獨立的媒體，從中央的大報到各地小報，無一不是政策宣傳的工具。自晚清到民國，各類報紙背後都有來自特定利益集團的挹注，有些報紙的目的甚至是造謠，並不能代表真正的公共輿論。因此，要將報紙作為史料加以運用，必須先釐清報紙的贊助者、政治立場、主編的背景與地方商賈勢力的關係等。最重要的是，要能掌握報紙信息的性質，以及哪些東西沒被報導。

檔案不僅補足過往研究的缺憾，也開啟 1950 年代研究新的可能性。檔案儘管是由官方選擇性公開的資料，仍可配合 90 年代以後陸續問世的民間史料、回憶錄、日記與訪談錄等，重建 50 年代地方社會的樣貌。馮老師指出，目前關於 1950-1979 年的研究太少，然而 1979 年以後的當代課題，往往必須放在 50 年代以來的歷史背景中，方可窺其崖略；而 1949 年以來的轉變與延續，也應該透過 50 年代的時空加以觀察。目前馮老師正致力於推動 50 年代各方面的研究，未來的成果令人引頸期盼。

對於同樣瞄準地方社會的「華南學派」，馮老師也從檔案的角度，提出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。首先，馮老師認為，華南學派現有的研究忽視檔案的重要性。事實上，許多縣級、區級的基層檔案，頗可與族譜、碑刻等材料所記載的人群

活動相互參證。其次，華南學派的學者較少將研究時限拉到 1949 年以後。使用民國與中共的檔案，不僅能以更長的時段觀察地方社會的運作模式，也可進一步評估現代化與 1949 年之後的局勢變動對基層造成的影響。再者，地方的歷史條件並非一成不變，透過檔案，可以重建政策與制度操作大致的演變歷程，正好可以做為基層社會組織與派系運作的參照。這將豐化我們對地方社會的理解，使華南學派的「套利」理論得到更好的發揮。

一言以蔽之，馮老師的史學方法，就是要揭開地方上隱性的權力結構。舉凡檔案、報紙等各類型的地方文史資料，都是地方派系與權勢群體競合的場域。這些人在基層社會各擅勝場，卻隱沒在國共兩黨各自宣稱的歷史進程之中。就此而言，解構檔案與報紙，不僅有助於還原基層權力網絡，亦能進一步質疑現代化與民族國家搏成的大歷史敘事。此即馮老師治史的旨趣所在。



▲馮筱才老師演講實況（2014 年 6 月 5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）

